

张大可等 著

三国人物

新传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张大可 等著

三国人物

新传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前言

三国鼎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三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三国时期的军事，金戈铁马，气势壮阔；三国时期的经济，变革重大，承先启后；三国时期的外交，纵横捭阖，奇峰叠出；三国时期的人物，英雄辈出，业绩昭著。特别是三国人物，三国故事，自宋元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传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说曹操，曹操到”，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熟语，可见三国故事影响之深。由于三国鼎立，人谋规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三国时期人物的复杂关系，他们的智慧谋略，给人们留下很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这就是三国故事历久不衰，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有人把三国谋略用于竞争，引入管理思维，获得成功，更增添了三国故事的活力。

本书《三国人物新传》，原题《三国人物评传》，是20世纪80年代中笔者在兰州大学任教时组织的，广泛邀请作者参与，意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者有42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以高校教师为主，有的是我的学生。作者署名于篇后。成都武侯祠对该书出版给予很大的支持，武侯祠研究员谭良嘯同志受邀共同主编。全书由笔者策划、组织、统稿，不少稿件做了重写，保持全书的一致性，态度十分严谨。现在时过境迁，作者队伍有很大变化，很多失去了联系。2001年笔者重访成都武侯祠，建议修订本书，未得可否。本书出版的当年成了畅销书，很多读者早已买不到这本书，笔者不断收

到读者来信希望获得这本书，以增长知识，加强文化修养。有的中学历史教师将本书列为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为此，笔者对全书重新做了修订校核、编排，以崭新的面貌在新世纪面世，以享读者。并通过本书的出版，联络旧友，不也是一件畅快的事吗！

本书50名三国历史人物，从《三国志》记载的数百个历史人物中精选出来，分为六编，从一个侧面揭示三国鼎立的过程，展示影响这一历史时代最杰出人物的风采，供人们评说、鉴赏。每传二三千字到四五千字不等，力求行文畅达，言之有据，评价中肯，便于阅读，启迪思维，做到开卷有益。全书人物配上头像，增强感性，拉近时代距离，加深亲切感。全部画像由甘肃天水师院美术系刘坚同志绘制，十分感谢。

本书新版以崭新的面貌奉献给新世纪的读者，是一本新书，希望继续受到广大知识青年和中学生的欢迎，更加热爱历史。以上说明是本书的一个历史过程。是为前言。

张大可

2002年6月



前 言	1
-----------	---

序论——“人谋”在三国鼎立 形成中的历史作用	1
---------------------------------	---

第一编

——东汉末年的军阀

董卓	19
吕布	31
公孙赞	39
袁绍	49
刘表	59

第二编

——曹操和他的智囊团

曹操	69
荀彧	77
郭嘉	95
程昱	103
贾诩	111
刘晔	117

第三编

——曹魏名臣武将

田畴	125
钟繇	131
任峻	137
陈群	141
高柔	147
夏侯惇	153
张辽	157
张郃	163
徐晃	167

第四编

——蜀汉君臣

刘备	175
诸葛亮	185



关羽	199
张飞	205
马超	211
赵云	217
法正	223
刘巴	229
廖立	233
李严	239
魏延	245
张嶷	253
蒋琬	259
邓芝	255
姜维	269

第五编

吴国君臣

孙策	275
孙权	281
张昭	293
顾雍	301
周瑜	307
鲁肃	315
吕蒙	323
黄盖	333
陆逊	339
诸葛恪	345

第六编

一统三国人物

钟会	355
邓艾	365
杜预	375
王濬	381
司马懿	389

序论——“人谋”在三国鼎立 形成中的作用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的历史课题。脍炙人口的三分故事自宋元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传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至今三国人物、三国故事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本书从《三国志》中选取了四十七个人物，从《晋书》中选取了三个人物，合五十个人物传。重点选取三国形成时期的人物，着重探讨“人谋”在三国鼎立形成中的作用。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谈。

一、三国鼎立的多因素历史原因

汉末历史何以形成三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是不能够回答的。学术界所流行的经济均衡论导致了三分，即北方经济遭破坏、南方经济发展形成南北均衡而成为三分的立国基础的说法，只是历史的原因之一，而绝非必然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以独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无需均衡也可成割据态势。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就有巴、蜀、楚、吴、越的割据。至汉末，割据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而与曹、孙成鼎立之势呢？可见三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更迭出现，而三国

鼎立却是唯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局面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而导致变异的历史原因，就不是常规的必然性，这是简单明了的逻辑。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也可以将此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一种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天无二日，人无二王，人心思统一。所以秦、西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解体后，很快就走向了统一。但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现象都有比较复杂的原因，而不能单纯用“经济均衡”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是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来。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从公元190年关东兵起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止，前后九十一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90至207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十八年，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22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

历史阶段，前后五十一年。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地理均势、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作用才形成的。在这些历史原因的形成中，“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我们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二、东汉末军阀混战形成了三分的人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军阀混战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近佞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庸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略疏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驭才有术。而后袁

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渐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设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吴主传》裴注《江表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偶然性”；但已然胜利之后，使形势逆转，弱者成为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袁绍之败。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他积聚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袁绍不仅有可恃的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又首倡讨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之士多归之，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魏义、颜良、文丑、高览、张郃等勇士为之统其军。但是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堕入了灭顶的深渊。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

之计，既要急于进取，而又丧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焉能不败。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对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拱手让曹，先输了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藉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有曹操与袁绍如下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与曹操相比，袁绍只是一个“小器”，王夫之说：“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读通鉴论》卷九。下引王夫之语均出此篇，不再注）袁绍能屈韩馥、公孙瓒之辈，而不能屈曹操，故不能建非常之业。曹操高于袁绍，不只是个人的政治素质，而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袁绍看重的是地利和兵力，曹操看重的是人才

和道义。所以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亮传》。下引诸葛亮语出此篇者，不再注）十分精当。

曹操赤壁之败。曹操用兵如神，善能以少胜众，以弱克强。但在赤壁之战中却是御众而败，盛强而摧，大出人意料之外。王夫之分析说：“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就是说，曹操也没有真正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以扶持大义，而是为一己之私利用权术驾驭人才。谋士的意见，投合自己的私心就采纳，不投合自己的私心就不采纳。曹操的赤壁之败，正是如此。他不听贾诩、程昱的善计而急于东进，重蹈了袁绍拒谏的覆辙，走上了恃众欺寡、恃强凌弱的失败之路。曹操之急于东进，也正如袁绍之急于南下一样，是急于做皇帝梦，故冒行以建非常之功，结果是志骄意得，欲速而不达，被孙刘联军的智力所击败。赤壁之战是一场斗智斗力的群英会。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齐心合力共御曹操，而曹操却颐指气使，以一人刚愎自用之智，抗天下群英之会，败亡也就是必然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前者袁绍失败，后者曹操失败，使统一的局势一再受挫，而演成三分之局。这两次弱者挫败强敌的战役，都是“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壁之战，孙刘联合的基础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势为前提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就是“人谋”在规划三分。尽管刘备败逃，无存身之地，但“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程昱

传》所载曹操谋士程昱语)，所以孙权对诸葛亮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孙权语见《诸葛亮传》）。诸葛亮出使江东就是以鼎足之形为条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他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东汉末军阀混战，为何人才三分，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前已述及，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绍，后归曹操。鲁肃与刘晔友善，最初欲依巢湖郑宝，而后两人分道扬镳。诸葛瑾、诸葛亮，同胞兄弟，一个辅孙权，一个佐刘备。在乱世之中，局势未明朗之时，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下扰攘，君择臣，臣亦择君，又是必然之势。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未若江河之归大海，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试分析如下：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朝还没有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帜。两汉儒学昌盛，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气节，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袁绍传》裴注《献帝春秋》）。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多名节之士。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四方人才多归往之，这是得。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初起时不敌袁绍，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

流归了袁绍，如沮授、田丰、审配等；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方的时日，眼看孙权坐大、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及早消灭，这是失。关东军讨董卓，孙坚力战第一，义动天下，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张昭、周瑜、程普、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这是孙吴之得，反之则是曹操之失。刘备以帝室之胄，“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王夫之语，《读通鉴论》卷九），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周瑜传》）的恶名，刘备则以正统自居。诸葛亮辅刘备，不仅仅是报三顾之恩，而且也是扶持正统。这是刘备之得，亦是曹操之失。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杰，总揽英雄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曹操品德不济，奸险诈伪，暴虐无比，使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像诸葛亮、庞统等人宁肯归隐待时，也决不北投曹操。陈宫、张邈之叛，就是鄙薄曹操的为人。曹操傲慢，把蜀中使者张松推给了刘备，这是最大之失。东晋史家习凿齿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刘二牧传》裴注《汉晋春秋》）曹操不仁，多次屠城，滥杀无辜，并在征战中颁布了“围而后降者杀无赦”的反动军令，所以他始终未能获得“天命攸归”的舆论。曹操兵围汉献帝，失人臣礼，始终带着“汉贼”的帽子打天下。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刘所利用。因此，曹操不能像他的先辈汉高祖、汉光武那样囊括天下英雄，也就不能统一天下，只好作了个半壁河山的“周文王”而遗恨九泉。

三、“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 决定性作用

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都是三国鼎立的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是伴随着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而出现的，也是“人谋”因势利导而形成的必然之势。

所谓地理均势，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衡对方的一种策略。在使用戈矛甲盾作战的古代，占有险固地利形胜的一方在争雄角逐中明显地具有优势。蜀国有重山之固，吴国有长江之险，魏国据中原而地大人众，故吴蜀联合以抗魏，地理上形成均势，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均势。所谓政治均势，是指群雄割据或列国纷争之间的均衡外交斗争，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集团。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国遣使庆贺，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三分政治均势形成。

由于以上两个均势的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巩固下来。但这两个均势并不是平行的两个因素，而是“人谋”规划三分鼎立所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谋求地理均势，同时又谋求政治均势，而地理均势是政治均势的前提条件。所以，三国形成时期曹、孙、刘三方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都是围绕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随着荆州归属的解决才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而后出现了三分的政治均势。至此，三国鼎立的对峙，就成为了必然之势。

荆州居于四通的战略要地，其势为曹、孙、刘三家所必争。赤壁之战前，三家各有自己的打算。刘备要跨

有荆、益以成三分。孙权要进伐刘表，西窥巴蜀，竟长江所极与曹操对抗，形成南北对峙。曹操要并吞荆州，逼降孙权，统一天下。公元208年，曹操南下荆州，东进赤壁，形势逼使孙刘联盟。孙刘结盟就意味着孙权修正他的规划，走鼎足三分以观天下之变的路线。赤壁战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形势。这是曹操最忌的一着棋，而孙权下了这一着，使得他闻讯后大失常态，“方作书，落笔于地”（《鲁肃传》）。

孙刘联盟是推进三国鼎立形成的最重大的事件，它改变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造成南北均衡，方使得历史的进程向着“人谋”预定的三分轨道向前发展。导演孙刘联盟走向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而演出这幕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吴主孙权，曹操则从反面起了推动作用。孙权在大敌当前时忍痛修正自己竟长江所极的规划，借荆州给刘备，这是非同寻常的抉择。孙权的抉择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豪放胸襟和现实主义精神，比袁绍、刘备、诸葛亮的政治气度都要略高一筹，以至于竟出曹操的意外。袁曹官渡之战前夕，刘备不待袁绍大军发动，急于袭夺徐州，过早地亮出了反曹的旗帜，遭到曹操全力进攻，使自己站不稳脚跟。反过来，袁绍不纳田丰之策，不在曹操东攻刘备之时乘间举兵以袭曹操之后，坐失良机，遭官渡败北。刘备、袁绍两人不肯互援，皆因各存私心，缺乏战略远见，低估了曹操的应变能力。王夫之的分析说：刘备“先绍而举，则大功自己以建，而绍之威不张”；袁绍不援刘备，“亦犹昔者拥兵冀州，视王允之诛卓而不为之援，其谋一也”。结果是“两相制，两相持，而曹操之计得矣”。王夫之的这些分析，可以说是透视了袁绍、刘备两人的心骨。他们比起

孙权来要逊色得多。建安十九年，刘备不取汉中，却东出三峡与孙权争荆州江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反而让曹操先夺了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廖立语，载《廖立传》）。刘备的这一失计，既伤了同盟和气，又为日后的关羽失荆州种下祸根，表现了刘备政治气度的偏狭。相比之下，孙权却是恢宏大度而又权谋在胸。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不怕养虎在身；而又不失良机地讨还荆州，步步进取，灵活主动。孙权先是索还南三郡，而后袭杀关羽，全据荆州，改善了吴国的地理均势，增强了吴国的力量。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不惜向曹魏称臣，保证了夷陵大捷。孙权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孙刘联盟，使两家的事业走向胜利与发展；反之，两家失和，曹操渔利。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刘备复仇败夷陵，造成蜀弱吴孤，曹魏更加强大。吴蜀重新联盟，但元气已伤，失去了取胜之势，两国北伐均告失败。但是，孙权不得荆州，上流门户洞开，他就坐卧不宁，在同盟中只能扮演附庸的角色。所以孙权要拼全力与刘备争荆州，志在必夺，在这种形势下，刘备与诸葛亮既缺乏灵活性，又丧失警惕性，终于演出了吴蜀的悲剧。从地理形胜看，孙吴取得荆州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吴蜀两国才有可能结成巩固的联盟。但是蜀汉丧失了荆州，也就丧失了进入中原的前进基地；加之连吃败仗，力量削弱，又不能北据关中，刘备只能偏安于闭锁的益州，守险割据，而兴复汉室的隆中计划也就中道夭折了。

如果说，孙刘联盟对抗曹操求犄角之势，这是人谋